臺灣東亞文明研究學刊　第22卷第2期（總第44期）　2025年 12月　頁265~296

【研究論著】General Article　　DOI:10.6163/TJEAS.202512_22(2).0007

他城／我城：論也斯、王安憶散文中的港滬書寫

The Other City / My City: Hong Kong and Shanghai in the Essays of Yesi and Anyi Wang

蔣興立*
Chiang-Hsin Li

關鍵詞：也斯、王安憶、香港、上海、雙城
Keywords: Yesi, Anyi Wang, Hong Kong, Shanghai, Two Cities

2024 年 7 月 12 日收稿，2025 年 1 月 18 日修訂完成，2025 年 3 月 17 日通過刊登。

*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Associate Professor, Institute of Sinophone Studies, National Tsing Hua University

摘要

二十世紀末李歐梵提出的「雙城」觀點，啟發了滬港在近現代歷史文化中互為他者的鏡像思索。向來以中原文化為天下中心的中國版圖內，同屬座標邊緣的上海與香港有諸多錯綜複雜的微妙勾連。也斯與王安憶分別為港滬兩地具有指標意義的作家，兩者皆創作過遊觀他城（滬、港），銘刻我城的散文文本，並通過遊記的形式展現了兩地的文化傳播與交流。八〇年代至千禧年，是港滬同樣遭遇急遽變化的時期，本文聚焦於也斯與王安憶此一階段的雙城書寫，進窺也斯、王安憶的雙城觀察與想像，以及潛流於表層文本之下的深層底蘊，如何反映了兩地居民在歷史變革中的心理變化和身分認同的重建？兩人如何在書寫中丈量他城、我城與中國的距離？這兩座城市千絲萬縷的關係是什麼？鏡射魅影的懸想中，理想的烏托邦何在？本文希冀藉由前述的問題意識，細緻地考掘也斯、王安憶雙城書寫裡交織纏繞的內在葛藤，與其輻射出幽微深邃的空間意義。

Abstract

By the late 20th century, Leo Oufan Lee's "dual cities" perspective had inspired reflections on the cultural and historical parallels and contrasts between Shanghai and Hong Kong. As two cities located on the periphery of China's cultural map, outside the central plains' cultural core, Shanghai and Hong Kong share a complex and nuanced connection.Yesi and Anyi Wang, two prominent writers representing Hong Kong and Shanghai respectively, explored these connections through their essays. By writing about the other city (Shanghai for Yesi and Hong Kong for Anyi Wang) while reflecting on their own, they recorded the cultural exchanges and transformations between the two places, often in the form of travel narratives. The period from the 1980s to 2000 marked a time of dramatic change for both cities, and their works reveal the inner thoughts of the residents and the reconstruction of identities during these historical shifts.This paper examines how Yesi and Anyi Wang, through their writings, observed the distances between "the other city" and "their own city", as well as the intricate relationships between the two. In their reflections and imaginings, do they depict an ideal utopia? These writings express the inner struggles and profound cultural implications embedded in their dual-city narratives.

壹、前言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於《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提出詰問：「人們如何看待彼此，如何向自己與他人表述自我與他人？人們如何描繪巴黎社會的輪廓，理解自己所處的社會地位與空間位置，以及當時正在進行的劇烈轉變？而這些表述又是如何在政治論述的說詞中改換位置、運用與形塑？」[1]哈維的問題言簡意賅，答案卻盤根錯節，難以言盡。值得玩味的是，將哈維在探討巴黎現代性時提出的質疑，置放於香港與上海的雙城表述，又是否會得到別具意義的答案？城市不僅只是堆疊高樓、排列建築、收納貨幣與人群的容器，同時也具有社會文化的特殊意義，深刻影響著寄居其間的市民，塑造他們的心理狀態與生存方式。對於自古以農立國的傳統中國而言，因為喪權辱國的戰敗條約，以及西方異族的殖民統治而得以發跡變泰、締造傳奇的滬港雙城，其存在本身便是對中國的折辱，它們愈是富裕輝煌，愈是彰顯著西方的榮耀與中國的挫敗。此外，異國的殖民經驗也廣泛軒邃地改變了滬港市民的思維模式與生活型態，凡此種種，皆使得這兩座城市的居民與中國其他地區的國民判然有別。

從空間視角觀看，傳統「中國」以世界之中而自居，其版圖向來以中原文化為天下秩序的中心，同屬座標邊緣的上海與香港有諸多錯綜複雜的微妙勾連：皆因西方殖民勢力而改寫了曩昔邊陲與中心的位置，也因此與中國內地間產生此起彼落的意識角力；此外，作為中國最繁華的兩座海岸城市，滬港之間也同樣存在著彼長我消的矛盾轇葛。二十世紀末李歐梵提出的「雙城」觀點，啟發了滬港在近現代歷史文化中互為他者的鏡像思索。[2]黃宗儀以王家衛與王安憶的作品為例，探討全球化的情境下，港滬之間的雙城論述，[3]陳國球亦曾於分析葉輝《書寫浮城》一書時提到：「香港

[1] 大衛•哈維（David Harvey）：〈詞語與表述〉，《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黃煜文（譯）（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 年），頁 281。

[2] 李歐梵：〈雙城記〉，《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增訂本)》，毛尖（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年），頁 339-353；該論著最初的版本為 1999 年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推出的英文版。

[3] 黃宗儀：〈互相凝視與自我書寫：王家衛與王安憶的雙城故事〉，《面對巨變中的東亞景

和上海並稱雙城，文化往來多所互動，葉輝的探討自有其客觀的基礎，〔……〕」[4]綜上所述，前揭論著再再強化了滬港之間文化與文學的相互牽繫。

也斯與王安憶分別為港滬兩地具有指標意義的作家，舒非曾分析：「我讀《也斯的香港》時，覺得和《王安憶的上海》有點相像。這相像之處在於他們的角度。〔……〕重點不放在繁華的街道和鬧市之中，他們喜歡擷取都市的某個獨特的側影，〔……〕」[5]舒非對也斯城市散文的評論，點出也斯與王安憶對於我城書寫的共相，他們並不正面描寫香港與上海，而是藉由微不足道的瑣碎細節，再現他們所見所感的城市景深。除了同樣別具隻眼地勾勒我城，王安憶在一九八七年寫下遊記〈美麗的香港〉，也斯於一九八九年發表了〈時空的漫遊——訪問上海〉，他們都曾在八〇年代行過港滬時，記錄了對鏡像之城的遊觀見聞。[6]唐捐嘗論及「沒有一種文類，像散文（特別是抒情散文）這樣，重視『我』的演出。散文常常是在進行著『我思、我感、我看、我說』，但究其實，也是在思我、感我、看我、說我。」[7]唐捐以為散文中的「我」作為情之發動者，似乎是先於文，決定了文的品質與樣態，「我」才是文的書寫對象，通常還是文中的焦點。由此觀之，儘管也斯與王安憶除散文外，仍有其他的文類創作涉及港滬，但值得進一步推敲的是：對於具有代表性的香港作家也斯與上海作家王安憶而言，他們如何在直抒性靈的散文文類裡，表述他們居住的城市在

觀：大都會的自我身分書寫》（台北：群學出版社，2008 年），頁 106-126。

4 陳國球：〈書寫浮城的文學史——論葉輝《書寫浮城》〉，《香港的抒情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年），頁 115。

5 舒非：〈序〉，收入也斯：《也斯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05 年)，頁 2。

6 除了遊記散文的創作外，也斯曾撰寫論文〈從〈迷樓〉到《酒徒》——劉以鬯：上海到香港的「現代」小說〉，分析劉以鬯現代小說在港滬兩地的發展；王安憶則書寫過小說《香港的情與愛》，刻劃上海人的香港故事。此外，兩位作家也互有往來，也斯提過王安憶曾在他家中作客，抱著他女兒留下合影照片，王安憶也是他非常尊敬的小說家。詳文參見也斯：〈序〉，《昆明的除夕》(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 年)，頁 3。本文主要聚焦討論的散文文本，分別是也斯的〈時空的漫遊——訪問上海〉(1989 年)、〈電車的旅程〉(1999 年)，王安憶的〈美麗的香港〉(1987 年)、〈尋找上海〉(1999 年)，並輔以相關散文進行研究；選擇較析的文章除了發表的時間點相近外，包含寫作手法，文本中的觀點皆有值得比較與探究之處，筆者將於內文進一步剖析與細論。

7 唐捐(劉正忠)：〈他辯體，我破體〉，《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3 年 6 月 6 日。

世變中的輪廓與面貌？當他們換位遊歷鏡像他城，「他者」的多重意涵如何在文本內被開展？其書寫如何標誌了他們自身所處的社會位置？如同本文的標題「他城／我城」， 若將斜線視為鏡射的符號，「我」如何從他城的形像，發現我城的意義？回到哈維的觀點，「我」又是如何透過再現我居住與遊觀的空間，在表述自我與他者的過程，建構「我」的價值認同與主體定位？

本文主要透過文本細讀與比較研究的方式開展論述，為探討前述議題背後的文化機制，本文擬援引彼得・艾迪（Peter Adey）《移動》（*Mobility*）[8]、斯維特蘭娜・博伊姆（Boym.s.）《懷舊的未來》（*Future of nostalgia*）[9]、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10]等論述進行觀測。彼得・艾迪認為移動性是一種跟世界產生關聯、參與，並在分析上理解世界的方式。《移動》一書觸及移動性與移動性的觀念，試圖在全球化的時代中，闡明移動性如何涉入當今世界運作中的許多重大過程。[11]本文藉由彼得・艾迪對「移動」的觀點，思考個體在地理、文化與心理層面上，從「我城」邁向「他城」的轉變，以及如何在移動過程中重構對自我與他者的認知。博伊姆《懷舊的未來》提到：「懷舊具有某種烏托邦的維度」「全球化激發出對於地方性事物更強烈的依戀。」「在一個生活節奏和歷史變遷節奏加速的時代裡，懷舊不可避免地就會以某種防衛機制的面目再現。」[12]「懷舊」是雙城書寫中關鍵的情感動力，本文擬以博伊姆的見解，考掘在全球化背景下，也斯與王安憶如何透過懷舊展現對城市身分的反思，與對未來烏托邦的期待。齊格蒙・包曼提出的「液態現代性」，是相對於先前的「固態」現代性而存在，回應了一

[8] 彼得·艾迪（Peter Adey）：《移動》*(Mobility)*，徐苔玲、王志弘（譯）（新北：群學出版社，2013 年）。

[9] 斯維特蘭娜·博伊姆（Boym.s.）：《懷舊的未來》*(Future of nostalgia)*，楊德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年）。

[10] 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陳雅馨（譯）（台北：商周出版社，2018 年）。

[11] 彼得·艾迪（Peter Adey）：《移動》*(Mobility)*，徐苔玲、王志弘（譯），頁 xvii-7。

[12] 斯維特蘭娜·博伊姆（Boym.s.）：〈導言：忌諱懷舊嗎？〉，《懷舊的未來》*(Future of nostalgia)*，楊德友（譯），頁 2-3。

九八二年馬歇爾・博曼（M. Berman）描繪現代社會文化特性的著作《所有堅固的事物皆煙消雲散：現代性經驗》（*All That Is Solid Melts into Air: Experience of Modernity*），《液態現代性》企圖指出一切講求快速、彈性的當代問題，包括親密關係的輕盈與脆弱，或是不尊重生命與自然資源、「用後即丟」的輕視浪費等。[13]齊格蒙・包曼的觀點聚焦於當代人際關係、身分認同、空間邊界、文化脈絡的不穩定與流動性。綜上所述，這些理論概念並非各自孑立，而是在雙城書寫中交織共構。「移動」的過程往往觸發個體「懷舊」的抒情念想，當也斯與王安憶在「他城」中尋找熟悉的文化記憶時，懷舊成為重構身分與價值認同的重要途徑。同時，「液態現代性」的流動特質又進一步強化了對「我城／他城」模糊邊界的考掘，這使得雙城書寫不僅是對地理空間的藍圖表述，更是對現代性文化困境的深刻省思。

一九七〇年代末期中國改革開放，一九四九年後在左翼政權的政策領導下蛻變為工人老大哥形象的上海，在八〇年代重新回到戰前資產階級的摩登浪潮之中，並迎來了一股「追憶老上海」的懷舊熱。香港經歷了七〇、八〇年代的經濟躍升，並在八〇、九〇年代進入本土流行文化的黃金歲月，歷經了《中英聯合聲明》、九七回歸〔……〕八〇年代至千禧年，是港滬同樣遭遇急遽變化的時期，本文試圖聚焦於也斯與王安憶此一階段散文中的港滬書寫，進窺也斯、王安憶的雙城觀察與想像，以及潛流於表層文本之下的深層底蘊，兩人如何藉由殊異的視角觀看滬港？如何透過文本建構雙城的歷史與真貌？如何在書寫中丈量他城、我城與中國的距離？這兩座城市千絲萬縷的關係是什麼？鏡射魅影的懸想中，理想的烏托邦何在？本文希冀藉由前述的問題意識，細緻地考掘也斯、王安憶雙城書寫裡交織纏繞的內在葛藤，與其輻射出幽微深邃的空間意義。

[13] 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陳雅馨（譯），頁7。

貳、遊觀他城

也斯（1949-2013），本名梁秉鈞，是香港本土文學發展的關鍵人物，擁有詩人、散文家、小說家、大學教授等多重身分，也曾嘗試跨媒體的創作。陳國球認為也斯的作品充滿香港本土氣息，又有非常國際的視野，這或許正是香港的「本土」意涵，不離腳下的塵土，又經常流動、飄移與越界。[14]陳國球將也斯的書寫風格與香港文學緊密扣合，也斯從廣東遷居香港的移民身分，他創作中保有的跨國視野、穿透力與彈性，都被認為是香港文學的表徵。王安憶（1954-）同樣是從外地移居上海，王德威曾以「海派文學，又見傳人」來形容她，「王安憶是屬於上海的作家」，也許正是她被所居住的城市賦予的風格，她的書寫誇張枝蔓、躁動不安，卻也充滿了固執的生命力。王德威同時比較了張愛玲與王安憶筆下的上海，「張愛玲也擅寫庸俗的、市民的上海，但她其實是抱著反諷的心情來精雕細琢。」王安憶失去了張那種有貴族氣息的反諷筆鋒，卻實踐了一種更實在的海派生活形式。[15]從王德威所言，能從中窺知王安憶刻劃了上海市民務實、強韌，卻又隱藏著躁動與細節的海派意識。要而言之，陳國球以也斯為例，說明香港文學的國際化與兼容性，王德威則認為王安憶寫出了庸俗實在的海派生活；然而許子東卻曾在文章中論及：「上海文學（及上海文化）以『洋』（國際化）為榮，〔……〕而香港文學（及香港文化），則以『俗』（本土化）自衛，〔……〕」[16]前述諸位學者的洞見精闢深刻，對於理解梁、王二位作家的文學風格大有裨益，卻也耐人尋味地將港滬文學與文化置放於一個撲朔迷離的鏡像宇宙，究竟兩者的文學與文化風格如何辨識？本文試圖從王安憶、也斯八〇年代行過港滬、遊觀他城的散文文本進一步辯證釐析。

一九八〇年代，香港確定將於一九九七年回歸中國，此一事件讓香港

[14] 陳國球：〈詩裏香港——從金制軍到也斯〉，《香港的抒情史》，頁138。
[15] 王德威：〈海派文學，又見傳人——王安憶的小說〉，《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14年），頁385-389。
[16] 許子東：〈『上海文學』與香港文學——兼談『三城小記系列』的緣起〉，《吶喊與流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年），頁212。

成為被世界注目的空間。文革結束後，四個現代化建設的推動下，一九七八年施行門戶開放政策，上海成為中國經貿發展的重點，原本匯集南方的資本湧入，使上海迅速崛起。黃宗儀認為一九八〇年代後期以來，極力發展為全球城市的上海，提供了一個具體複雜的例子讓我們思考全球城市形象塑造的意識型態。[17]無論是即將華麗轉身，雄心萬丈地投入全球城市行列的上海；或者是即將回歸中國，覺得浮動忐忑的香港；八〇年代對於港滬兩地，同樣是充滿變動、開展傳奇的時刻。

彼得・艾迪（Peter Adey）認為：「移動本身就具有種魔力，盡力擺脫現實、向『上』的實踐，暗示著力圖離開現有的滯固／桎梏狀態。就算是重複的移動（同樣的路徑，去到同樣的地方，但肯定也都會有些許的不同，〔……〕）」[18]旅遊與遷移都關涉到個人的主體意識，在此前提之下，移動是一種選擇，思索如何與世界相處、發生關聯，同時也是取捨如何定錨人生，以及定義自己的方式。也斯、王安憶皆為移民，作為經貿中心的港滬，本就是吸納大量移民尋找機遇的空間，移動者的血液裡存在著擺脫現狀、掙扎向上的渴望，或許是此一原因，讓王安憶一九八七年邂逅彼時被譽為「東方之珠」，經濟繁榮的香港時，讚嘆道：「我們站在黑暗的山頂，看見了燦爛輝煌的香港。」「轟轟烈烈的香港頓成一個繁華似錦的白日夢」，〈美麗的香港〉字裡行間滿溢著對於這座輝煌城市的艷羨，開端以城市日落後的美景為起點，尾聲時又重新返還香港的日落，內文鋪陳了夜景的壯麗，流淌的燈河、汽車如光斑、風馳電掣的電車、購物的狂潮〔……〕「全世界的皮鞋和女裝在你眼前展開，就像一個國際的博覽」。「太陽與大樓並列在晚霞飛舞的天幕，頌歌與悲歌波濤湧起，瞬間變成了永恆。」[19]日落是標誌著自然性與非自然性景觀的界線，閃爍不滅的光河炫耀著人類的力量與現代文明的高度。高樓華廈是延伸了人為意志的表徵空間，人造高樓櫛比鱗次的不夜城中，與日齊高、俯視人間的摩天大樓化身

[17] 黃宗儀：〈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談老上海的懷舊論述〉，《文化研究》，創刊號（2005年9月），頁76。

[18] 彼得·艾迪（Peter Adey）：《移動》*(Mobility)*，徐苔玲、王志弘（譯），頁xi-xviii。

[19] 王安憶：〈美麗的香港〉，《接近世紀初》（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年），頁180-182。

為資本主義的符號，讓群眾仰望著現代文明的權威。王安憶對於香港這人造景觀的集合空間充滿敬意。疇昔南來文人所詬病的香港物質主義，在她眼中卻閃閃發光，商品盛宴與購物狂潮也化為奇觀。相較之下，文中所描述的自然景致則充滿了強烈的張力與不可控的力量，「山頂的風很狂野地吹擊」、「身後的山上長著茂盛的荒草」、「烏雲湧動著推進，閃電在雲間劈開蛇形的裂紋，山野的風鼓動著茂盛的樹林，雨來了。我們貼在山崖下避雨，依然遭到粗暴的襲擊，轉眼間淋得透濕。」[20]顯然面對變幻不定、難以捉摸的自然旋律，王安憶似乎更融入人造裝置、現代秩序的都市節奏，「我走在車與人的洪流之中，會有一種驕傲的心情，好像變成一部交響樂某個聲部中的音符，在一個全奏的段落裡激昂地響起。」[21]

〈時空的漫遊——訪問上海〉（以下簡稱〈訪問上海〉）最初發表於一九八九年《香港文學》七月號至九月號，是一篇連載了三個月的長篇散文，也斯曾自言他在上海住了一個多月，只寫了這一篇散文。[22]周蕾嘗論及「抒情」對也斯而言，是一種反身性的風格，一種內向的視野，而在此視野中，藉由謀篇布局，這一自我成為客體，並與這個世界相融。周蕾分析也斯的詩歌，認為他很有意思的嵌入一個第二人稱「你」，並與之展開想像的對話。[23]誠如周蕾所言，也斯的抒情是深刻的返觀內照，靜觀凝視內在客體，多層次地建立與世界的關係。〈訪問上海〉亦採取了第二人稱「你」的方式敘事，以此帶有距離的視角觀看上海。「我」與「你」的區隔，是一種「我」與「非我」的主客體劃界行為，隱含著排除異己的邏輯。如果從唐捐的觀點論之，抒情散文是一種聚焦於「我」的演出，那麼在這場〈訪問上海〉的表演裡，也斯將自己分裂為二，來自香港的「我」，隱身於遊觀上海的「你」，「我」與「非我」，主體與客體，時而交流對話，時而獨自細語，漫遊的過程，不只是記錄上海的市井日常，

20 王安憶：〈美麗的香港〉，頁180-182。
21 王安憶：〈美麗的香港〉，頁181。
22 詳文參見曾卓然（主編）：《也斯的散文藝術》（香港：三聯書店，2015年），頁19、頁273。
23 周蕾：〈也斯與抒情〉，張屏瑾（譯），收入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下）》（台北：麥田出版社，2021年），頁462-464。

同時也想像這座城市的歷史，並且在時空的罅隙中尋找著香港的前世今生。「酥蛋蛋糕像香港的菠蘿包。〔……〕醃菜的氣味叫你想起香港的南貨鋪。你用熟悉去理解陌生，想用相似去消除差異。」[24]民以食為天，也斯藉由市井庶民最在意與介懷的食物連結港滬，傳達移民者為了一日三餐、五穀雜糧而漂洋過海，遷居他鄉，聚會於城市的源起。「你在這新的城市裡，卻總在忖想舊的城市，想過去人們提起，從書本上讀到的那個城市，想新的城市怎樣逐漸從舊的城市變化出來。」[25]已有諸多論述提及八〇、九〇年代時，香港的影視文藝創作者將香港的前世與三〇、四〇年代的上海相互勾連，[26]兩者的共通點皆是仰望著西方的進步文明，擁抱著資本主義的現代性，血脈裡卻又與古老的中國無法分割。也斯在今日的上海遙想昔日風華絕代的十里洋場，而在頻頻回顧的歷史記憶中，他又想起了香港的未來。

也斯發表此篇遊記的時間點是一九八四年《中英聯合聲明》與中國八六學潮之後，正值八九民運、六四事件的敏感時機，八〇年代是充斥著理想主義的時代，文中他「寫下當時閱讀中國的感受，也有一種共鳴與憂慮。」[27] 如同曾卓然所言：「遊記散文經常直面現實，在書寫風土人情時作家實難以迴避政治對現實的影響。」[28]也斯面對逐漸崛起、勢不可擋的龐然中國，箇中情緒曖昧複雜；被英殖民或者回歸母土，香港並沒有選擇權，凝目而視飄渺無常的未來，文人只能從大國的邊陲位置，以邊緣視野一面仰望著富麗堂皇的「中國夢」，一面書寫歷史抗拒遺忘。曾經消失的繁華如夢的「老上海」[29]不僅是香港的前世，是否也會是香港的未來呢？「他城」與「我城」的分界於是變得虛線化，新舊城市被拼貼疊影。故

[24] 也斯：〈時空的漫遊——訪問上海〉，《昆明的除夕》(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年)，頁55-56。

[25] 也斯：〈時空的漫遊——訪問上海〉，頁57。

[26] 李歐梵於〈雙城記〉便曾論述過此一議題，分析香港電影中的老上海形象。詳文參見李歐梵：〈雙城記〉，毛尖（譯），頁348-355。

[27] 也斯：〈序〉，《昆明的除夕》，頁2。

[28] 曾卓然：〈香港遊記散文中的中國(節錄)〉，收入曾卓然（主編）：《也斯的散文藝術》，頁262。

[29] 本文所定義的「老上海」，指涉的是1949年之前，民國時期(1912-1949年)的上海。

此，〈訪問上海〉中，也斯化身為漫遊時空的旅人，思索英領事館的今昔之別，遙想過去「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以及英女皇伊莉莎白來訪的歷史，探訪上海博物館，張愛玲、劉以鬯的舊時住所，懷念起過去的先施、永安公司、百樂門〔……〕，「沿路散步，你會看到種種優雅的建築，大部分是過去留下的。」「上海的老作家巴金先生一再呼籲成立『文革』博物館，這實在饒有意義。這一代的歷史，應該銘記在青銅上，讓大家清楚真相。只有把歷史材料開放出來，讓更多人知道，然後才可以引為鑒戒，悲劇才不再重演。」[30]也斯筆下，老上海的建築不是無個性、無歷史的舊容器，也斯試圖為其施展復魅的魔法，讓原本組織都市結構碎片的物件重新發聲。也斯穿梭在歷史與現實的上海之間，捕捉瑣屑的遺跡，試圖以邊緣注視中心，還原記憶。當敘事者「你」在追憶老上海時，「我」悠然遐想的卻是香港的未來。於此同時，王安憶的「中國夢」已然蓄勢待發。

在「中國夢」尨然巨大的版圖內，「上海夢」是位居樞紐的一塊關鍵拼圖，這塊拼圖的夢想原型或許與「美麗的香港」相連。與也斯的觀點相仿，王安憶鬆動了「他城」與「我城」的界線，使其呈現流動的狀態，港滬雙城的關係是流動融通，而非相互對立。即使一九八〇年的上海已迥異於民國時期的魔都，混雜了左翼的骨血，王安憶也不同於三〇年代的摩登女郎，擁有上山下鄉的知青身分，但一九八七年的王安憶顯然並不留戀文革時期那段下鄉插隊的知青歲月，王氏曾提過她始終不能適應農村，不能和農村水乳交融，心境總是很抑鬱。[31]當她把農村時空視為傷痕文學裡的一處載體空間時，這可以適切地解釋為何〈美麗的香港〉中，當她歌頌著香港繁花盛開的商品現代性與機械文明時，自然景觀總是隱身於黑暗與陰影裡，充滿不安與對抗的氛圍，似乎讓人連結起知青下鄉的往事。文本裡的「美麗香港」並非「他者」，更趨近於上海試圖擬仿的物件，一座即將被複製的未來城市，一種更具現代秩序的目標典範；被視為非我族類、應當

[30] 也斯：〈時空的漫遊——訪問上海〉，頁61、頁67。

[31] 王安憶：〈農村，影響了我的審美方式——王安憶談知青文學〉，《王安憶說》（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年），頁107。

被排除的「異己」與「他者」，反倒是那烏雲密布的窮山惡水，以及原始景觀背後的傷痕記憶。王安憶〈美麗的香港〉藉由香港的輝煌景象，映射她對現代性的讚美，並以自然與都市的相互參照，凸顯城市文明的力量；而也斯〈訪問上海〉則以第二人稱的敘事方式，遊走於上海的歷史與現實之間，以存在距離的「非我」視角重構城市記憶。雙城鏡射的觀看方式，使得兩者在敘述風格與關注重點上呈現互補之態：王安憶更偏重物質與秩序的刻畫，也斯則聚焦於歷史罅隙中的細瑣記憶，兩者共同揭示了港滬雙城在全球化進程中，作為現代性表徵與記憶載體的空間意涵。

儘管港滬之間有著諸多共相，在也斯與王安憶一九八〇年的文章中，也依稀可見其觀點：今日或歷史的他城，皆有可能是未來的我城。然而香港與上海仍舊有著不同歷史命運所形塑而成的差別，此一殊異也影響了文學的面貌。從殖民歷史而言，港滬有著半殖民地與完全殖民地之別；從文學上探析，由於殖民經驗與殖民時間軸線的迥然，以及面臨即將回歸中國的九七大限，皆使得八〇至九〇年代的香港文學較上海文學有著更強烈的邊緣意識，在精神面向上呈現一種海上浮沉，無岸可依的蒼茫之感。

> 在海邊，你看到海港通向遼闊的大洋，外面無盡的世界。你想著這個城市，不禁回想起你來自的那個城市。你不禁想到歷史，又隱約地想到將來。[32]

〈訪問上海〉的末尾，也斯望著八九年憧憬能再度向世界靠攏的上海，然後他想起了香港，在充滿抒情餘韻的段落尾聲，讀者彷彿也同時讀到了遊蕩在城市邊緣的也斯無以名狀的感傷。當移動者以「他城」為觀測目標時，其觀看方式常帶有浪漫化或理想化的特質，這種心理機制使「他城」成為某種「幻城」的象徵，既承載了創作主體對理想空間的投影，也反映了其對「我城」的批判性反思。也斯在〈訪問上海〉中，透過食物的相似性模糊了港滬邊界，並在歷史建築與現實上海間往返思索，展現其對香港未來的隱憂與期待。無獨有偶，王安憶在〈美麗的香港〉中，將香港的繁

[32] 也斯：〈時空的漫遊——訪問上海〉，頁73。

華景象構築為上海現代化的理想典範，這是對「他城」的凝視，亦是對「我城」文化底蘊的反省。文化反身性（cultural reflexivity）在此過程中尤為樞紐，這種反身性透過文學書寫表現為創作主體在「他城／我城」間移動折返，既反映了主體對異地文化的接納與批判，也揭示了自我認同的流動與重塑。[33]

參、微觀我城

城市是文化雜合的閾限空間，隱含了某種價值向度的呈現，時間則是累積文化價值的工具，人如何在都市有限的畛域中尋找與創造自己無限的意義，是城市文學書寫者關注的核心議題。《懷舊的未來》（*Future of nostalgia*）提到「懷舊」是對某個不再存在或從來沒有過的家園的嚮往，懷舊是一種喪失和位移，也是個人與自己的想像浪漫的糾纏。剛開始，我們以為懷舊是對某個地方的懷想，實際上是對一個不同時代的懷想。我們往往設法以歸屬修補懷想，以重新發現身分來修補失落的恐慌感。[34]關於懷舊與香港、上海的關係，已有學者論及：陳智德分析了香港文學一九五〇年至二〇〇七年的懷舊史，引用多位香港作家的文學文本，細緻地闡釋香港文學懷舊的創造性，並認為九〇年代香港懷舊潮的根源，是從九七回歸所引發，但從八〇年代便已展開。[35]朱晶、鄺新年提出「上海懷舊」與一九九〇年代「告別革命」、現代化意識形態，以及資本主義全球化戰略有著密切關係，「懷舊是一種社會集體行為，是一種選擇和認同。對舊上海的記憶實際上是對新上海的一種想像。」[36]前述論者的分析，闡示了港滬雙城於九〇年代所開展的大規模懷舊浪潮的原因，上海試圖要重塑世界大都會的

33 此處感謝匿名審查委員提供的寶貴意見。

34 斯維特蘭娜·博伊姆（Boym.s.）：〈導言：忌諱懷舊嗎？〉，《懷舊的未來》*(Future of nostalgia)*，楊德友（譯），頁2-4。

35 陳智德：〈香港文學的懷舊史一九五〇——二〇〇七〉，《根著我城：戰後至2000年代的香港文學》（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年），頁539-578。

36 朱晶、鄺新年：〈九十年代的「上海懷舊」〉，《讀書》，第4期（2010年4月），頁145-147。

輝煌而懷舊，香港的懷舊則恰好是恐懼失去此一輝煌。也斯、王安憶於九〇年代後期、千禧年之交，皆有書寫我城的文章，〈電車的旅程〉、〈尋找上海〉不約而同地都以懷舊的視角，採取「微觀城市」的敘事手法，詮釋作家的「我城」，回應世紀末憶昔戀舊的氛圍。

一九九九年發表的〈電車的旅程〉，內容描述也斯與其法國作家朋友同遊香江，乘坐著電車觀想港城。文本內的敘事者再度分裂成「我」與「你」，然而不同於〈訪問上海〉的「我」，自始至終，藏身於「你」，隱而未現。〈電車的旅程〉「我」現身為主要的敘事對象，確立敘事者的主體概念與存在意識，與代稱為「你」的遊客，一個攜帶著異域烙印的外來者，展開對話。也斯藉由「我」與「你」，再度將己身裂解為「我」與「非我」，想像自己為異文化的「他者」，回望香港；試圖建構審美距離，將熟悉的居住城市陌生化，藉由留白空間，重新審視故鄉。文本再度從上海的食物說起：「北角當年有小上海之稱，我記得傍晚時分上海館子生煎包的香氣，」[37]也斯與友人以象徵著現代性的「電車」為移動中介，以電車的軌跡為移動的路線，一路從春秧街街市、北角、維多利亞公園、銅鑼灣、跑馬地、灣仔、中環〔……〕依循電車的軌跡，搖搖晃晃地前進。文章開端，也斯提出質詰，「我該怎樣帶你認識我的城市，當上天和地產商把它變得對我愈來愈陌生了。」[38]也斯選擇偕同友人前往電車總站，坐上電車，隨著它緩慢的步伐，走到哪看到哪。如前文所述，移動性本身被賦予了意義，移動的方法與路徑影響著我們對於城市的想像與理解，移動性甚至是具有意識形態的，被隱匿於政治權力的論述之中。

《由電線車說起：駛過百年的軌跡》提到搭乘電車是每位遊客來港必做的活動之一，在電車上，能夠享用全世界最便宜的車資，卻感受到十分浪漫的旅程，親歷一個中西融會的城市。[39]電車的費用十分親民，成為市井

[37] 也斯：〈電車的旅程〉，收入吳風（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也斯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4年），頁389。

[38] 也斯：〈電車的旅程〉，頁389。

[39] 謝耀漢、John Prentice：《由電線車說起：駛過百年的軌跡》（香港：中華書局，2022年），頁12。

庶民喜愛的大眾交通工具，也斯與法國友人在九七回歸之後，選擇乘載著殖民時期歷史，以及香港市民集體回憶的電車，晃晃悠悠地行過庶民路線的港島。「親愛的遊客，你這一次真的有機會去體驗本地人的生活了，包括日常瑣碎、沉悶、避不開又無可奈何的一面，」[40]「我」嘗試以「親愛的遊客」視角，立足於親密卻疏離的位置，解構既定的生活秩序，將原本熟稔的同質世界，裂解為存在縫隙與解讀可能的陌異空間，將自己從固有的文化脈絡中解離，將風景轉化成事件，觀看這座城市極其瑣碎的日常即景。鳳城茶樓、樂聲、豪華戲院、廟宇、太古廣場的時裝店，電車經過消失的郵局、消防局的舊址，「在那兒，你還可以看到一些唐樓〔……〕仍然帶著戰前上海與廣州的風格，宣示了它與過去的聯繫。」[41]行過香江，百年電車串起了香港人的衣食住行、精神寄託、休閒娛樂、生命經驗。老電車的庶民路線，象徵著港島市民的生活方式，電車的方便廉價，反映了市民撙節務實的精神，車廂裡的乘客偶然相聚、短暫停留，錯身而過，從此訣別，如同這座島上的移民際遇。沿途的風景在電車的牽引下，不再是靜置、固著、被動的死物，或被觀看、無生命的客體，而與電車行駛流動的軌跡、電車上的乘客，發生主客相融的質變關係，彷彿港民與港島間的情感嗔癡。港島電車帶著西方殖民現代性的烙印，與港鐵、或高鐵相較，其具備的現代化程度似乎略遜一籌，然而這不甚徹底的西方現代性，反倒與香港的本質相呼應，呈現香港在中西之間異端、邊緣的位置，也呈現出香港新舊文化並存的特點。也斯細數這城市的歷史，他將「地產商」的位置與「上天」並列，兩者地位相當，道盡市井小民「香港居大不易」的無奈，地產商背後的人為勢力，公共政策的闕失，自然與超自然的命運支配，有形與無形的力量，變化了這座城市的面貌。也斯的香港故事從上海開始，也從上海結束，暗示著這座城市長久以來，仍舊無法斷開與滬、廣的連結。

「我真的難以描述我所居住的城市，上海，所有的印象都是和雜蕪的個人生活摻和在一起，就這樣，它就幾乎是帶有隱私的意味。」「現實的

[40] 也斯：〈電車的旅程〉，頁391。
[41] 也斯：〈電車的旅程〉，頁393。

日常生活卻是如此的綿密，甚至是糾纏的，它滲透了我們的感官。〔……〕它對於我們實在是太具體了，具體到有時候只是一種臉型，一種口音，一種氣味。」[42]王安憶的我城書寫從她記憶裡的上海臉相開始描繪，街面上小煙紙店的女店主、出租小書攤的老闆、無業青年、職業婦女〔……〕各有各的臉相，「那時候，這條街上的臉相是很豐富的，不像現在這樣整齊劃一。」[43]王安憶接著琢磨起上海的市聲，無軌電車的聲音、夜歸的腳步聲、靜夜裡的人聲、遠方的汽笛聲，「也不知是車還是船在啟程。這也感到城市的遼闊，」[44]然後，王安憶摹寫上海的氣味，梅雨季的溼氣、水窪裡發出的腐味、人的體味、頭油味、衣服陰乾的異味〔……〕。黃宗儀嘗提出詰問：「王安憶既已身在上海，又何需尋找眼前的上海？」[45]王安憶在文章的尾聲回應道：「現在上海已成了新話題，〔……〕可在那裡面，看見的是時尚，也不是上海。」「再要尋找上海，就只能到概念裡去找了。」耐人尋味的是，在文本的最後，她似乎找著了已然消失的上海。

> 倒是在某些不相干的時間和地點，不期然地，卻看見了它的面目。那還是一九八七年，在香港，有一晚，在九龍的麗晶酒店閒坐，正對著香港島，香港島的燈光明亮地鑲嵌在漆黑的海天之間。這真是海上奇觀，蠻荒之中的似錦繁華，是文明的傳奇。於是，陡然間想起了上海，〔……〕這畫面何等壯麗，上海原來是這樣冉冉升出海面，雲霧散盡，視線走近，走近，走了進去，被瑣細的筆觸掩埋，視線終於模糊了。[46]

不同於也斯的電車遊港，王安憶採取緩步徐行的方式，徒步追憶我城點滴。城市不斷汰舊換新，隨著舊城的容顏消失，與之附著的傳統、思

[42] 王安憶：〈尋找上海〉，《尋找上海》（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年），頁1-5。
[43] 王安憶：〈尋找上海〉，頁12。
[44] 王安憶：〈尋找上海〉，頁16。
[45] 黃宗儀：〈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談老上海的懷舊論述〉，頁81。
[46] 王安憶：〈尋找上海〉，頁22。

想、制度、習俗、生活方式，也將一併煙消雲散。王氏試圖捕捉「一年一個樣，三年大變樣」之前的上海老樣子。「作者於作品中一再強調昔日上海里弄生活細節才是老上海光華精髓所在，」「細讀她的上海『家城』(“home city”)書寫，生活中看似微不足道的瑣細事物是成就上海璀璨風華的要素。」[47]耐人尋味的是，王氏藉由懷舊，感慨老上海的靈光消失，面目全非，不願意過往豐富的臉相被某種一致性所取代，並且以緩慢的步調與快速變遷的全球化抗衡，藉由漫步、凝視、勾勒舊日微光裡的上海往事，以豐富的細節來憑弔被資本主義全球化改造之前的故鄉；前述諸種舉措似乎都是面對快速變遷的新上海的喟嘆，但另一方面王氏卻認為可以在香港璀璨的傳奇裡，邂逅回憶裡的老上海。然而弔詭的是，華麗璀璨的香港其實是另一個在資本主義體系擴張下，被全球化時代的文化霸權不斷改造的空間。

對照八〇年代的〈訪問上海〉、〈美麗的香港〉，文本裡書寫了對「他城」的思辨或憧憬，或多或少隱約透露了對自我主體的某種不確定性；十餘年後，發表於九〇年代的〈電車的旅程〉、〈尋找上海〉，聚焦於「我城」的歷史考掘，似乎是意圖建構與強化自我的主體性。也斯與王安憶皆以「顯微」的筆法，抒情地懷想意念風景裡的我城。「微」字有多重意涵，微是細小、秘密、衰落、邊緣、隱匿、卑賤、昏暗不明、精妙幽深〔……〕，[48]兩人的「微言」各自有其「大義」，書寫的手法雖然相近，文本的內蘊卻各異其趣。葛亮曾評論張愛玲置身於戰時香港的心態：「對『大』的冷漠規避與對『小』的執著成就了張愛玲的香港鏡像。」[49]王安憶以筆尖微雕上海時，是否也存在著張愛玲的心態，對宏大敘事的冷漠規避與對微小世情的熱切執著？王安憶曾說：「我們這一代是沒有信仰的一代，〔……〕理想的最大敵人根本不是理想的實現所遇到的挫折、障礙，而是非常平庸、瑣碎、卑微的日常事務。在那些日常事務中間，理想往往

47 黃宗儀：〈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談老上海的懷舊論述〉，頁80。

48 高樹藩（編）：《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新北：正中書局，2017年），頁0447-0448。

49 葛亮：〈城與他者〉，《繁華落盡見真淳：王安憶城市小說書寫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21年），頁116。

會變得非常可笑，有理想的人反而變得不正常了，甚至是病態的，而庸常之輩才是正常的。」[50]文革之後，經歷了上山下鄉的真實體驗，理想的喪失，對於大我的冷漠無感，或許都是王氏選擇遁入巷弄小我的肇因。「微小」的人事物雖然尋常平庸，甚至隱密卑下，但是確切安穩，在理想主義逐漸淪為高談闊論的二十世紀末，眾聲喧嘩的市井微言，比起虛言妄語的形上理想，更顯得真實可親，深刻雋永。

同樣以瑣言碎語訴說我城日常歷史的也斯，卻有著不同的懸想。周蕾曾提到多重決定的地緣政治因素形塑著香港，英國的殖民歷史、東方主義、商業營利主義、人口過多、資源稀少以及與中國大陸的緊張關係等等，也斯的書寫與文學文化生產總居於邊緣的香港，有著十分密切的關係。[51]香港地緣政治的邊緣性，建構了也斯文學文本的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後殖民時期對於香港邊緣立場的自覺，也使得他作品中的抒情性混雜了政治意涵。有別於王安憶凝視與筆繪弄堂鄰里的市井群像，也斯對我城的注目是一種遊蕩式的觀看，對比前者敘事主體的安然穩定，後者的敘述主體則分裂而晃動。「遊」是一種「居間狀態」，無所歸屬，浮沉其間，「遊蕩」不受既定秩序的約束與控制，同時具有一種向權力抗衡的象徵和實踐意義，這或許投射了也斯以及部份香港市民的心態。搭乘殖民時期的老電車，徘徊在百年歷史的軌跡上，記錄著所到之處的視覺之象，訴說著人造建築背後的文化符碼與象徵印記，此一微觀書寫隱含著從邊緣向中心發聲，以追憶懷想拒絕消失遺忘的執念。

也斯與王安憶的懷舊書寫，不限於追憶疇昔，還呈現對未來城市的想望。也斯的電車行旅以流動的視角串起香港的百年記憶，藉由「我」與「你」的主體分裂，構築一種邊緣性的注目，重新審視熟稔的城市空間。相較之下，王安憶以徒步徐行的方式，凝觀上海里弄的瑣細生活，捕捉城市在快速變遷下的靈光消逝，並試圖通過懷舊抵抗全球化帶來的單一性與失根感。她筆下的「尋找上海」不僅是對舊上海的緬懷，更是對新上海的

[50] 王安憶、陳思和：〈兩個69屆初中生的即興對話〉，《上海文學》，第3期（1988年3月），頁75。

[51] 周蕾：〈也斯與抒情〉，張屏瑾（譯），頁462-463。

質詰與再定義。兩人在懷舊書寫尾聲的「觀想他城」，隱喻了港滬雙城之間的歷史與文化連結。也斯以香港的視角遙望上海，王安憶則以上海的記憶勾連香港，文本中呈現出「他城與我城」的重層疊影，既是一種抒情回望，也是對未來城市藍圖的懸想。王斑認為「懷舊情感」與「烏托邦的願景」密不可分，九〇年代的懷舊，與八〇年代具歷史批判意識的懷舊態度不同，是為了用來舒緩現世躁動的心靈，此時期的懷舊情緒是為了對抗全球化的勢力，懷舊情緒，蘊含著烏托邦的意願。[52]也斯與王安憶都在懷舊我城的文本尾聲觀想他城，他城與我城的異日疊影，他城是否是我城未來的烏托邦？本文將於下文深入釐析。

肆、城籍與國籍

李歐梵認為「長期以來香港一直是以老上海為藍本。」[53]從八〇年代開始，上海轉而將香港（老上海）視為空間重建的未來。關於滬港，在命運與歷史的多重疊影之下，人們究竟是如何去辨識這兩座城市的面貌？跳脫文學的範疇，聚焦城市的臉相，李歐梵嘗論及張愛玲對滬港的看法：「對張愛玲來說，當香港在令人無望地全盤殖民化的同時，上海帶著她所有的異域氣息卻依然是中國的。」[54]張英進卻評述李氏並未解釋清楚「中國式的概念」，並舉例張藝謀的《搖啊搖，搖到外婆橋》（1995）透過好萊塢的歌舞重演，展示舊上海同樣願意把自己賣身於殖民地的要求，女主角如意（鞏俐）也願意將她的「中國式」的嫻靜舉止和處女身分，賣給殖民化的摩登上海。[55]王安憶認為上海與香港都是世俗的，「最具世俗的特徵的，怕就是上海了。香港也有一些，但比較誇張，更像是俗世的舞台，是戲劇化

[52] 王斑：〈以創傷基調的革命後歷史：本雅明的啟示〉，《全球化陰影下的歷史與記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年），頁86-89。
[53] 李歐梵：〈雙城記〉，毛尖（譯），頁 355。
[54] 李歐梵：〈雙城記〉，毛尖（譯），頁 342。
[55] 張英進：〈游離於香港與上海之間：懷舊，電影，文化想像〉，《中外文學》，第 29 卷第 10 期（2001 年 3 月），頁 56-57。

的俗世。」[56]魯迅則早在一九二七年就提出看法，魯對於滬港二地的印象十分近似，皆是外國殖民主站在中間，高等華人（懂外國話）、奴氣同胞在第二圈，之外則是默默吃苦的老百姓。[57]綜前所述，無論是依據事物的外部特徵，或者是根據事物的本質屬性來分界，我們都會發現滬港之間的重複值難以簡單排除。「世俗」、「戲劇化」、「崇洋媚外」、「異域氣息與中國骨血」〔……〕這兩座城市的臉相對於旁觀者而言，重疊性是如此驚人，或許我們可以試著歸返港滬雙城早期的鏡像版本「老上海」進一步思忖釐析。

橫光利一認為一九二〇年的上海是一個難以理解的地方，「巴黎是向上達到了頂點的都市，上海則是向下墮落到了極點的都市。」「上海既不是中國的，也不是歐洲的，」給人的感覺是，腫脹到快承受不住的肉團，正從高層建築的窗子裡分泌出來，是一種屬於將來才會出現的惡。正常人是無法揣摩這個世界上這些極為墮落的人們的生存狀態的，上海是向下墮落到了極點的都市。[58]橫光利一將上海形容為一個腐敗墮落的魔都，上海到底有多惡？惡從何來？張屏瑾以為橫光利一對於上海惡之華的批判，「指向思想上的一種混亂、無序和虛無，」[59]老上海的虛無也體現在張愛玲身上，王安憶提出張愛玲對世界的看法是虛無的，「張愛玲的世俗氣是在那虛無的照耀之下，變得藝術了。」「張愛玲的人生觀是走在了兩個極端之上，一頭是現時現刻中的具體可感，另一頭則是人生奈何的虛無。」[60]前揭文人對於老上海「虛無感」的體會，應與其殖民文化與移民社會的特質關聯甚深。橫光利一指涉的「思想上的混亂失序」，是從認同西方理性秩序的標準來檢視上海，試圖將殖民者認可的文明規範強加在被殖民者身上，

56 王安憶：〈世俗的張愛玲〉，《尋找上海》，頁 183。

57 詳文參見魯迅：〈再談香港〉，《而已集》（上海：北新書局，1928 年），頁 165。魯迅：〈現今的新文學概觀〉，《魯迅全集•第四卷•三閑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頁 133。

58 橫光利一：〈靜安寺的碑文〉，《感想與風景》，李振聲（譯）（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30。

59 張屏瑾：〈上海惡之花：從橫光利一而來的上海書寫〉，《上海文學》，第 2 期（2019 年 2 月），頁 124。

60 王安憶：〈世俗的張愛玲〉，頁 188。

解構其原本的意識形態與文化傳統，重建殖民者文化脈絡之下的秩序規則。橫光利一與其他攜帶著相同異域烙印的外來者，將上海視為一種「惡」的奇觀，在這銳利的目光之中，同時也切割出階層、等級、強弱、優劣等權力失衡的社會場域，一種在城市象限中進行的政治性劃界行為。而陷落於此一充滿政治區隔的階級空間內的族群，是一群移民上海的異鄉人。

吳福輝認為上海人人源的構成方式，是把人從五湖四海聚到一起，上海極富同化能力，彷彿融化人的熔爐，無論哪一省哪一縣的人，來到這個現代商業社會的文化環境，這批外鄉人都會被改造成「上海人」，幾乎可以亂真。他們認同上海，取得了「上海性」，無論何地之人，一到上海，不能不染三種習氣：趨時、務奢、尚圓滑。世界各國大都市，其居民最富同化能力者，莫如上海。[61]吳福輝提出的觀點適切地詮釋了上海人何以會產生「城籍」與「國籍」身分認同的辯證，因為誠如橫光利一的觀點，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上海並不全是中國的，而是一種因緣際會之下，從中國與西方的摩擦之間裂解出的縫隙空間，從中誕生的新人種便是上海人，此一新品種的上海人與中國其他各省的國民大相逕庭，其共相是趨時、務奢、尚圓滑。移民血液裡對追求更好生活的渴望，驅使他們變得圓滑世故、務實功利、及時行樂。

出於生存的競爭壓力，移民選擇走入城市現代化的進程，城市市民過分放大物質消費的意義，使得商品物件轉化為主體，人性與情感退居為客體。個體的自我存在價值逐漸被商品的意義與價值所取代，個體產生自我物化的心理，同時日益認同這種自我物化的過程。馬克思（Karl Marx）認為商品乍看之下是一種簡單而平凡的東西，做為使用價值時，並無任何神秘可言，然而當勞動產品由使用價值轉變為交換價值，勞動產品變為商品之後，它便化身為超越感官知覺的元素，由物質性轉變為非物質性。[62]商品

[61] 吳福輝：〈突兀的現代人——海派文化心理和行為方式〉，《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年），頁 83。

[62] 詳文參見卡爾·馬克思(Karl Marx)：《資本論•第一卷》*(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台北：聯經

從無機的物質客體中分離，成為超越人類感性主體的存在，化為一種神祕的有機元素。個人的主體性被物質稀釋，人性與情感的價值也在商品價值的膨脹下，被擠壓得斷裂而破碎，被投射在碎片化的城市商品之中。人的性格與情感被商品重新形塑，都市人對於瑣碎物質的認同由此而生，上海人便是在此一移動與拜物的循環結構裡逐漸感覺漂浮與虛無，這不僅只是上海人面臨到的處境。王鈺婷曾引用張讓之言，論及漂流的現代定義，「二十世紀是漂流的世紀，二十世紀的文學是漂流文學，現代人活在一個漂流的概念裡，漂流的定義不斷被擴大。」[63]《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一書亦曾提到，現今的我們處於一種液態現代生活型態，「流離失所」的人們不斷增加。現今的商品生產傾向於用「立即報廢的拋棄式產品」取代了「耐用物件」。在這個世界，刻意不穩定化的物品是必然不穩定的身分認同的原始建材，因此人們必須持續保持警覺，需要捍衛自己的彈性及重新適應的速度，以便能夠快速跟上外部世界的變化模式。[64]終生僱用制與專職工作愈來愈稀缺，派遣型與約聘制工作日益增加，新型態的工作讓我們如同拋棄式物品般存在，不穩定的生存方式也影響著我們面對他人、社會與生命的態度。唯有奮力一搏才能翻轉這種棄物般的命運！便成為移民社會與移動市民的共識。我們所身處的不堪一擊、稍縱即逝、變化莫測的現代生活，其實早在百年前的上海便已出現，因此吳福輝說：「海派的故事只有一種，便是『人生無常』。」[65]

失去故鄉的人、情感維度被物質與貨幣所控制、貧富懸殊的階級社會，是世界上諸多國際城市的現代性共相。雖然歷經屈辱殖民的歷史命運，但二十世紀初期的上海，是中國呈現此一現代性都會特質的初期版本。一九四九年之後，香港承繼了相同的都會精神與風貌，一九八〇年開始，上海則以香港為目標，試圖再現老上海的花季容顏，三者形成一種

出版事業公司，2017 年），頁 71-72。

63 王鈺婷：〈離散與家國之間：論張讓散文中跨界經驗與「局外人」身分〉，《文史台灣學報》，第 8 期（2014 年 6 月），頁 69。

64 齊格蒙·包曼(Zygmunt Bauman)：《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陳雅馨（譯），頁 25、頁 151。

65 吳福輝：〈老中國土地上的「現代」神話——海派小說文化風貌〉，《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頁 173。

「前世、今生、未來」微妙的環形時空結構。王安憶〈尋找上海〉尾聲的「香港夢」勾連的其實是一九四九年之前的「上海夢」。「香港是一個象徵」，讓人悠然回憶起老上海曾經一度是與巴黎、紐約等大都會並駕齊驅的傳奇之地。「老上海」是一個具有歧義性的曖昧概念，中國民族主義者與左翼知識份子聚焦的是其喪權辱國的殖民性，除此之外的他者關注的，卻可能是「老上海」進步文明的現代性。中國八〇年代以降，「民國時期的上海」成為一個遙遠的烏托邦，如果願意遮蔽掉「華人與狗不得入內」的牌子，那麼老上海便隱喻著中國最接近世界的時刻：中國亦有現代化的可能，中國可以與世界接軌，中國可以如此繁華進步〔……〕儘管民國時期的上海是一個包含了租界區的半殖民地，但它仍然還有一半是屬於中國的，無法切斷的臍帶仍緊密連繫在中國的母土上。

關於「城籍」與「國籍」身分認同的辯證，香港面臨的境遇比上海更為複雜。王家琪提到八〇、九〇年代後，後殖民成為香港文學的首要語境，引導學者致力追尋香港的主體性，而都市又被視為香港文學的主要特色，都市成為本土身分認同的展演處與後殖民載體。學者回過頭來追溯七〇年代是本土意識萌發的時代，部分香港文學作品此時開始描寫和表現本地都市風景、生活方式和市民意識，被視為本土意識的重要里程碑。[66]香港人的身分建構是由香港殖民政府首肇其端，為了與左派人士建構「敵我之分」的副產品。一九六七年香港的左派暴動，是一場由香港左派份子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影響而發起對抗香港政府的暴力行為。「六七暴動」後，「香港人」、「香港是我家」的論述將香港政府與市民聯繫起來，成為一個利益共同體，齊心協力對抗左派。[67]也斯在〈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中剖析香港身分認同的問題，以及其中難以解釋清楚的含混性與邊緣性，「香港人相對於外國人當然是中國人，但相對於來自內地或臺灣的中國人，又好像帶一點外國的影響。他可能是四九年後來港的，對於原來在本地出生的人，他當然是『外來』或『南來』了；但對於七、八〇年代南來的，他

66 王家琪：〈香港文學的都市論述及其邊界〉，《中國現代文學》，第 38 期（2020 年 12 月），頁 81-82。

67 許崇德：〈「六七暴動」與「香港人」身份意識的萌生〉，《二十一世紀》，第 169 期（2018 年 10 月），頁 90-91。

又已經是『本地』了。」[68]香港的「國籍」認同被「城籍」認同所取代，與殖民歷史相互綰結，其身分認同的複雜又與移民的組成結構息息相關。承前所述，移動者致力於突破封閉與固著的僵局，力圖實踐向上發展的可能。上海與香港都曾是讓移民奮鬥成功、譜寫白手起家童話的傳奇所在。多元開放、兼容並蓄，集結東西方的高度文明與歷史文化，也斯所遙想的老上海正是這樣的一處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烏托邦，這同時也是他對香港的城市設定，他在〈訪問上海〉中論及：「說到上海文化，今天的上海人會重提明代的老祖宗：科學家徐光啟，一個既在中國社會中周旋得開，也是最先引進西方科技的人物。這種實際、開朗、寬容、多元的文明，也往往是沿海都市孕育出的理想。」[69]在時間審美距離的影響下，老上海成功化身為諸多華人投射中國現代性都會的完美鏡像，是一處華人移民憑藉夢想與努力可以創造奇蹟，並與世界齊頭並進的烏托邦。

也斯於〈訪問上海〉中描繪了邊緣城市香港如何遙望曾經的現代化中心老上海，藉由歷史記憶的拼貼補綴，為兩座城市的身分認同提供了一種詩意化的辯證。而王安憶則以〈尋找上海〉為例，將香港的現代性作為投射舊上海烏托邦的鏡像，反映了城市在全球化語境下的雙重定位：既是本土的，也是世界的。這些別具隻眼的獨特視角，標誌了兩位作家的文本意蘊，並非單純再現雙城的空間即景或歷史流變，而是通過文學書寫，挑戰並深化了「國籍」與「城籍」的文化對話。也斯與王安憶的港滬書寫，徘徊在雙城之間，雜蕪的個人生活與城市記憶摻和在一起，一面悼念著遺失的流金歲月，一面尋找著未來理想的烏托邦。舊容與新顏的替換重置，或者重層疊影，解構與建構著大都會的變貌。城市持續嬗變，永遠以嶄新的面貌出現，如同破滅再生的夢境。儘管也斯、王安憶等城市書寫者，嘗試在懷舊憶昔的抒情文本裡，悼念與再現他們青春記憶裡的故鄉，然而依附於時間皺褶的老城浮影，必然如海市蜃樓，難以復得。事實上，寄居在情感維度被稀釋、臉相日益模糊、變化莫測的現代性都市的我們，都可能是

[68] 梁秉鈞：〈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 年），頁 157。

[69] 也斯：〈時空的漫遊——訪問上海〉，頁 73。

流離失所、喪失故鄉的人，在瑣碎、漂浮、無根的異質空間裡，不斷經歷對內在自我的認同危機，必須反覆重置自己的身分認同與自我認知。我們或許會透過與其他時空的比較，或者與其他人的聯結來界定自己，在一次又一次地劃界與排除中，釐清自身的立場與位置。當我們竭力以不確定的語言描述他人時，其實是試圖在模糊的鏡像中尋找自己，這或許就是置身於充滿悖論的現代性都會市民的臉譜群相。

伍、結語

本文的論述初衷並非簡單化約或二元對立此一議題，而是希冀藉由城市與再現城市的文學文本之間的相互關涉，尋思城市空間與創作主體越界與對話的可能。在也斯與王安憶一九八〇年的文章中，依稀可見其觀點：今日或歷史的他城，皆有可能是未來的我城。然而香港與上海仍舊有著不同歷史命運所形塑而成的差別，此一殊異也影響了文學的面貌。由於殖民經驗與殖民時間軸線的迥然，以及面臨即將回歸中國的九七大限，皆使得八〇至九〇年代的香港文學較上海文學有著更強烈的邊緣意識，在精神面向上呈現一種海上浮沉，無岸可依的蒼茫之感。這種邊緣意識源於香港地緣的特殊性，亦深刻體現在其文學表述中。透過也斯對「遊」與「遊蕩」的描寫，呈現香港邊緣之域的別樣景致。也斯筆下的香港是一座帶著西方殖民色彩的現代化都市，也是一處文化符號破碎的場域，雖然被置放於全球資本主義體系的中心，卻因後殖民的歷史而存在邊緣性，也斯將個人身分的分裂感投射於城市的空間結構中，並以抒情的筆調勾勒市民們在「城籍」與「國籍」之間的游移心理。

〈電車的旅程〉、〈尋找上海〉兩篇文本，也斯與王安憶皆以「顯微」的筆法，抒情地懷想意念風景裡的我城。文革之後，經歷了上山下鄉的真實體驗，理想的喪失，對於大我的冷漠無感，或許都是王安憶選擇遁入巷弄小我的肇因。「微小」的人事物雖然尋常平庸，但是確切安穩，比起虛言妄語的形上理想，更顯得真實可親。香港地緣政治的邊緣性建構了也斯文學文本的文化想像與意識形態，後殖民時期對於香港邊緣立場的自

覺，使得他作品中的抒情性混雜了政治意涵。有別於王安憶凝視與筆繪弄堂鄰里的市井群像，也斯對我城的注目是一種遊蕩式的觀看，「遊」是一種「居間狀態」，無所歸屬，浮沉其間，「遊蕩」不受既定秩序的約束與控制，同時具有一種從邊緣發聲，與權力中心抗衡的象徵和實踐意義，這或許投射了也斯以及部份香港市民的心情。

上海與香港都曾是讓移民奮鬥成功、譜寫白手起家童話的傳奇之地。多元開放，集結東西方的文明與文化，也斯所遙想的老上海正是這樣的一處中西合璧、古今交融的烏托邦，這同時也是他對香港的城市設定。王安憶〈尋找上海〉尾聲的香港憧憬，勾連的其實是她對老上海的懷想，那個中國與世界最接近的烏托邦。上海與香港都存在著關於身分認同的思索與辯證，上海的「城籍」認同源自於移民結構，移民被這座現代性都會同化，而與中國其他城市的居民產生區隔。香港面臨的境遇比上海更為複雜。香港的「國籍」認同被「城籍」認同所取代，此一現象的肇端與殖民歷史相互綰結，其身分認同的複雜則與移民的組成結構息息相關。對於移民而言，其血液裡對更好生活的追求與渴望，驅使他們變得圓滑世故、務實功利、及時行樂。然而過度放大物質欲望、商品價值，以及消費的意義，卻會稀釋人性與情感，陷入一種虛無的狀態。置身於萬物皆可輕易拋棄的不穩定時代，我們的內在情感被物質、貨幣拆解重構，失去故鄉的陌異經驗，自我形象的模糊與破碎，身分認同的劃界與排除，此一分裂的狀態，往往是寄居在現代性都會的市民，面臨的日常境遇。因此，對於城市寄居者而言，想像遠方存在著一處如老上海、老香港般，憑藉努力，得以讓夢想實踐的機遇之地，便成為充滿罅隙裂縫的我城生活中，值得移動者期待的他城／幻城之旅，即使那不過是一處看不見、不存在、完美的海市蜃樓。

引用書目

近人文獻

也斯 Yesi

2005 《也斯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05 年）。
Yesi de Xianggang (Hong Kong: Sanlian shudian, 2005).

2012 《昆明的除夕》（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12 年）。
Kunming de chuxi (Hefei: Anhui jiaoyu chubanshe, 2012).

2014 〈電車的旅程〉，收入吳風（編）：《香港當代作家作品選集：也斯卷》（香港：天地圖書有限公司，2014 年），頁 389-393。
"Dianche de lücheng," in Wu Feng (ed.): *Xianggang dangdai zuojia zuopin xuanji: Yesi juan* (Hong Kong: Tiandi tushu youxian gongsi, 2014), pp. 389-393.

王安憶、陳思和 WANG, Anyi & CHEN, Sihe

1988 〈兩個 69 屆初中生的即興對話〉，《上海文學》，第 3 期（1988 年 3 月），頁 75-80。
"Liangge liujiujie chuzhongsheng de jixing duihua," *Shanghai wenxue*, Vol. 3 (1988. 03), pp. 75-80.

王安憶 WANG, Anyi

1999 《接近世紀初》（杭州：浙江文藝出版社，1999 年）。
Jiejin shiji chu (Hangzhou: Zhejiang wenyi chubanshe, 1999).

2002 《尋找上海》（上海：學林出版社，2002 年）。
Xunzhao Shanghai (Shanghai: Xuelin chubanshe, 2002).

2003 《王安憶說》（長沙：湖南文藝出版社，2003 年）。
Wang Anyi shuo (Changsha: Hunan wenyi chubanshe, 2003).

王斑 WANG, Ban

2006 《全球化陰影下的歷史與記憶》（南京：南京大學出版社，2006 年）。
Quanqiuhua yinying xia de lishi yu jiyi (Nanjing: Nanjing daxue chubanshe, 2006).

王德威 WANG, Dewei

2014 《如何現代，怎樣文學？：十九、二十世紀中文小說新論》（台北：麥田出版社，2014 年）。
Ruhe xiandai, zenyang wenxue?: shijiu, ershi shiji zhongwen xiaoshuo xin lun (Taipei: Maitian chubanshe, 2014).

王鈺婷 WANG, Yuting

2014 〈離散與家國之間：論張讓散文中跨界經驗與「局外人」身分〉，《文史台灣學報》，第 8 期（2014 年 6 月），頁 53-74。

"Lisan yu jiaguo zhijian: lun Zhang Rang sanwen zhong kuajie jingyan yu 'Juwairen' shenfen," *Wenshi Taiwan xuebao*, Vol. 8 (2014. 06), pp. 53-74.

王家琪 WANG, Jiaqi

2020 〈香港文學的都市論述及其邊界〉，《中國現代文學》，第 38 期（2020 年 12 月），頁 73-92。

"Xianggang wenxue de dushi lunshu ji qi bianjie," *Zhongguo xiandai wenxue*, Vol. 38 (2020. 12), pp. 73-92.

朱晶、鄺新年 ZHU, Jing & KUANG, Xinnian

2010 〈九十年代的「上海懷舊」〉，《讀書》，第 4 期（2010 年 4 月），頁 142-147。

"Jiushi niandai de 'Shanghai huaijiu,'" *Dushu*, Vol. 4 (2010. 04), pp. 142-147.

李歐梵 LI, Oufan

2006 《上海摩登：一種新都市文化在中國 1930—1945(增訂本)》，毛尖（譯）（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06 年）。

Shanghai modeng: yizhong xin dushi wenhua zai Zhongguo 1930—1945 (zengding ben), Mao Jian (trans.) (Hong Kong: Niujin daxue chubanshe, 2006).

吳福輝 WU, Fuhui

2009 《都市漩流中的海派小說》（上海：復旦大學出版社，2009 年）。

Dushi xuanliu zhong de haipai xiaoshuo (Shanghai: Fudan daxue chubanshe, 2009).

周蕾 ZHOU, Lei

2021 〈也斯與抒情〉，張屏瑾（譯），收入王德威（主編）：《哈佛新編中國現代文學史（下）》（台北：麥田出版社，2021 年），頁 461-466。

"Yesi yu shuqing," Zhang Pingjin(trans.), in Wang Dewei (ed.): *Hafo xin bian Zhongguo xiandai wenxueshi(xia)* (Taipei: Maitian chubanshe, 2021), pp. 461-466.

唐捐（劉正忠） Tangjuan (LIU, Zhengzhong)

2013 〈他辯體，我破體〉，《中國時報・人間副刊》，2013 年 6 月 6 日。

" Ta bian ti, wo po ti," *Zhongguo shibao Renjian fukan*, (2013. 06. 06).

高樹藩（編） GAO, Shufan (ed.)

2017 《正中形音義綜合大字典》（新北：正中書局，2017 年）。

Zhengzhong xing yin yi zonghe dazidian (New Taipei: Zhengzhong

shuju, 2017).

梁秉鈞 LIANG, Bingjun

1995 〈都市文化與香港文學〉，收入張京媛（編）：《後殖民理論與文化認同》（台北：麥田出版社，1995 年），頁 153-168。
"Dushi wenhua yu Xianggang wenxue," in Zhang Jingyuan (ed.): *Houzhimin lilun yu wenhua rentong* (Taipei: Maitian chubanshe, 1995), pp. 153-168.

張英進 ZHANG, Yingjin

2001 〈游離於香港與上海之間：懷舊，電影，文化想像〉，《中外文學》，第 29 卷第 10 期（2001 年 3 月），頁 51-67。
"Youli yu Xianggang yu Shanghai zhijian: huaijiu, dianying, wenhua xiangxiang," *Zhongwai wenxue*, Vol. 29, No. 10 (2001. 03), pp. 51-67.

張屏瑾 ZHANG, Pingjin

2019 〈上海惡之花：從橫光利一而來的上海書寫〉，《上海文學》，第 2 期（2019 年 2 月），頁 120-127。
"Shanghai e zhi hua: cong Yokomitsu Riichi erlai de Shanghai shuxie," *Shanghai wenxue*, Vol. 2 (2019. 02), pp. 120-127.

許子東 XU, Zidong

2004 《吶喊與流言》（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4 年）。
Nahan yu liuyan (Shanghai: Shanghai wenyi chubanshe, 2004).

許崇德 XU, Chongde

2018 〈「六七暴動」與「香港人」身份意識的萌生〉，《二十一世紀》，第 169 期（2018 年 10 月），頁 77-94。
"'Liuqi baodong' yu 'Xianggangren' shenfen yishi de mengsheng," *Ershiyi shiji*, Vol. 169 (2018.10), pp. 77-94.

陳國球 CHEN, Guoqiu

2016 《香港的抒情史》（香港：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2016 年）。
Xianggang de shuqingshi (Hong Kong: Xianggang zhongwen daxue chubanshe, 2016).

陳智德 CHEN, Zhide

2019 《根著我城：戰後至 2000 年代的香港文學》（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9 年）。
Genzhuo wocheng: zhanhou zhi 2000 niandai de Xianggang wenxue (New Taipei: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2019).

黃宗儀 HUANG, Zongyi

2005 〈全球城市的自我形象塑造：談老上海的懷舊論述〉，《文化研究》，創刊號（2005 年 9 月），頁 73-96。
"Quanqiu chengshi de ziwo xingxiang suzao: tan laoShanghai de

huaijiu lunshu," *Wenhua yanjiu*, Vol. 1 (2005. 09), pp. 73-96.

2008 《面對巨變中的東亞景觀：大都會的自我身分書寫》（台北：群學出版社，2008 年）。
Miandui jubian zhong de dongya jingguan: daduhui de ziwo shenfen shuxie (Taipei: Qunxue chubanshe, 2008).

舒非 Shufei

2005 〈序〉，收入也斯：《也斯的香港》（香港：三聯書店，2005 年），頁 1-5。
"Xu," in Yesi: *Yesi de Xianggang* (Hong Kong: Sanlian shudian, 2005), pp.1-5.

曾卓然（主編） ZENG, Zhuoran (ed.)

2015 《也斯的散文藝術》（香港：三聯書店，2015 年）。
Yesi de sanwen yishu (Hong Kong: Sanlian shudian, 2015).

葛亮 GE, Liang

2021 《繁華落盡見真淳：王安憶城市小說書寫研究》（香港：中華書局，2021 年）。
Fanhua luojin jian zhenchun: Wang Anyi chengshi xiaoshuo shuxie yanjiu (Hong Kong: Zhonghua shuju, 2021).

魯迅 LU, Xun

1928 《而已集》（上海：北新書局，1928 年）。
Eryi ji (Shanghai: Beixin shuju, 1928).

1982 《魯迅全集・第四卷・三閑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2 年）。
Lu Xun quanji disijuan Sanxianji (Beijing: Renmin wenxue chubanshe, 1982).

横光利一 Yokomitsu Riichi

2005 《感想與風景》，李振聲（譯）（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2005 年）。
Ganxiang yu fengjing, Li Zhensheng (trans.) (Guangxi: Guangxi shifan daxue chubanshe, 2005).

謝耀漢、John Prentice XIE, Yaohan & John Prentice

2022 《由電線車說起：駛過百年的軌跡》（香港：中華書局，2022 年）。
You dianxianche shuoqi: shiguo bainian de guiji (Hong Kong: Zhonghua shuju, 2022).

大衛・哈維 David Harvey

2007 《巴黎，現代性之都》（*Paris, Capital of Modernity*），黃煜文（譯）（台北：國立編譯館，2007 年）。
Bali, xiandaixing zhi du, Huang Yuwen (trans.) (Taipei: Guoli

bianyiguan, 2007).

卡爾・馬克思 Karl Marx

2017 《資本論・第一卷》（*Capital: A Critique of Political Economy Volume I*），中共中央馬克思恩格斯列寧斯大林著作編譯局（譯）（台北：聯經出版事業公司，2017 年）。

Ziben lun di yi juan, Zhonggong zhongyang Marx Engels Lenin Stalin zhuzuo bianyiju (trans.) (Taipei: Lianjing chuban shiye gongsi, 2017).

彼得・艾迪 Peter Adey

2013 《移動》（*Mobility*），徐苔玲、王志弘（譯）（新北：群學出版社，2013 年）。

Yidong, Xu Tailing & Wang Zhihong (trans.) (New Taipei: Qunxue chubanshe, 2013).

斯維特蘭娜・博伊姆 Boym.s.

2010 《懷舊的未來》（*Future of nostalgia*），楊德友（譯）（南京：譯林出版社，2010 年）。

Huaijiu de weilai, Yang Deyou (trans.) (Nanjing: Yilin chubanshe, 2010).

齊格蒙・包曼 Zygmunt Bauman

2018 《液態現代性》（*Liquid Modernity*），陳雅馨（譯）（台北：商周出版社，2018 年）。

Yetai xiandaixing, Chen Yaxin (trans.) (Taipei: Shangzhou chubanshe, 2018).